

史官職司淺談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一、引言

承呂館長囑命，相邀與當今諸位國史專家作一閒談，俾以切磋學問，交流觀感。鄙人有此機緣，甚感榮幸。有幸承呂館長相招，令我有機會與貴館專家談論請教，亦是難得良機。只怕學殖不足，難符貴館之厚望。

在諸位專家之前，只能就最平常最通熟之國史作論題，在諸君之前姑妄雜談粗淺之見，以就教高明。自不免純是班門弄斧。

鄙見將此問題畫分五個層次，一層一層與在座專家交流會談，惟希不吝指教。

二、第一層次：國史在個人所具之專業職能

我國行政院體系之下，有數十個政務機關，除長官之外，其下大小俱是事務官，通稱公務員。國史館除館長一人是政務官，其中所有公務員俱是事務官與行政院各部全同。惟專業職司，只有國史館中人員是具有史官身分，其他機構人員沒有資格做史官。此一分職乃是國家特別需要，特別設置，乃是位列國家憲典，非同兒戲。

憑甚麼做史官，史官個人要具備一定條件，非一般之公務員，關鍵在於職司需要。正如章學誠所說：「理大物博，不可殫也。聖人為之立官分守，而文字亦從而紀焉。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於官；有法斯有書，故官

守其書；有書斯有學，故師傅其學；有學斯有業，故弟子習其業。官守學業皆出於一，而天下以同文為治，故私門無著述文字。（據《校讎通義》卷一）章氏所指，是自古以來學問學術之出於官守，有此一職官，即必由其專業需要而開出學術知識、法度、則例、規矩、方法、步驟，終成一門專業學問。至主張學問學術出於官守，早有班固《漢書》作此主張，世所熟知，不須引舉。據章氏所言，凡國史館之個人，其學問造詣，學術創績，俱當謹守所承職責、使命、規制、章程、法度，而合於史官之本分。

惟史官職守，世變代嬗，歷有變化，古今已大不相同。古之史官，位尊權重，乃有五史之別。有太史、下大夫、小史、下士、內史、中大夫、外史、中士、御史、中士、下士。其中內史位尊權重，為國君近身樞臣，掌王之八枋。八枋者，即爵、祿、置、廢、生、殺、予、奪。（說出於《周禮》）後至秦漢時代，已降至奉常屬官，下有太史令、太史丞，西漢名家有司馬談、司馬遷父子為太史令。有尹咸為太史令。其所具備之專業職能，比今世繁重。若司馬遷，除寫歷朝本紀及世家、列傳之外，所作十表，最見優長，足顯史事之曲折。

尤其須熟習一代政典，其八書皆專門政事。有天官、封禪、禮、樂、律、曆、河渠、平準之分紀。西漢太史令尹咸尚以數術為專業，分六門，即天文、曆譜、五行、著龜、雜占、形法。（世人不知形法乃指相地形、相寶劍、寶刀、相六畜，皆謂形法。）今日之史官，俱不再兼此六門專長。

雖然古今有別，而就今時身負史職之

員，仍必須以寫史、傳史為專長，特別是做今日之史官，更須知識深廣，要能剪裁駕馭同代之各樣文牘、檔卷、法規、條章，以及關係重大之談話、文告、講演，總滙以撰寫當年之史志。史官之特有職能是甚麼？乃是通熟古今興亡廢舉，百代人事滄桑。史官之必要本領是甚麼？就是充分掌握時變，扼要寫下每年每日之大事。因是在歷練言，在學習言，仍須追趕古代史官典型。

我願建議國史館諸君，雖

是研治當代之史，仍須精讀一些古史書。至少須能讀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這四種書，目的是為了歷練自己之史筆，史家之文不同於文家之文。劉知幾曾言：「文人不可以作史。」章學誠曾言：「文人不可以作志。」蓋史筆謹嚴切當，用字講究，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，一字之貶嚴於斧鉞。我輩治史，須具備此等造



王爾敏教授演講（攝影／陳曼華）

詣。

一般常說：歷史自有公論，或說蓋棺論定，此類說詞本於常識評斷，實際歷史來自記錄，一般人並不從事，或有記錄，即供作歷史倚據，其大體累積，仍在史書。史書所載史實，方構成論斷根據。史家據記錄著史，必是寫其所經過程。質言之，一切事發生之後，在塵埃落定之後，纔具備完整記錄，而史家記注史事更在其後，因是而能為世人公信。最明白說，史家下筆，是供千秋定論。是以史責在於千秋萬世不變之記錄，有此最後定斷，方使世人相信歷史自有公斷。

行政院屬下數十機構，其職責功能各自不同。若國防、國安、外交、新聞俱要盱衡世變，要爭朝夕。惟國史館決不要爭朝夕，而是爭千秋萬祀。是以不能追逐時髦世風，要把當代名人交由大眾投票決其高下。此則有兩重嚴重後果，淺則說，隨風氣轉移，取好大眾是為譁眾取寵，重則說史官把史筆之裁定權放棄，付予大眾，乃是根本失職。要問對當今歷史負的責任何在？奉勸諸位史官，莫再蹈此覆轍。

三、第二層次：國史館

《莊子·天下篇》有謂：「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」（引自《莊子》書）莊子簡語以述六

經各自要領。其中之《春秋》以道名分，即說明歷史之功用在於曉暢申論世間之名分。乃是史書之基本宗旨。

據上所陳，則知國史館之用心與表現俱在於能「道名分」。「國史」一詞，即表現此莊嚴典重之意義。向諸位祝賀政府之崇重授命，各機構無法比侔。譬喻說，鄙人治史一生，可謂著作等身，亦是位於近代領域，然不論著作如何，皆是私家著述，永遠不能冒國史之名，史家重名分，是不可任人冒濫國史的。惟國史館出書，則自然即是國史，名分為至要。貴館之人應該自重自愛。

今日國史館館長，古為太史，西漢承秦制而設有太史令，即今之館長，太史丞即今之副館長，俱是太常屬下之官。清代視翰林院具史館條件，所有翰林俱稱太史，是尊稱，尊其學問深邃、識見高遠。今之國史館，情同翰林院，名人傳記，多出翰林所撰，由是而能見國史館早有一定傳統。

今日實際上國史館已有其傳統。我所知者少，不能盡舉，但所知有若干優長之處，略提一二。

其一，《國史館館刊》是門面刊物，宜用心經營，惟辦館刊不同私家雜誌，決當提高水準。鄙見以為一年出一本最好，至多一年出兩本。不可貪多而力薄。

其二，《國史館通訊》，一年兩期甚妥。主要在於溝通同道各家研究消息，開會記述、人物介紹、史料評介，以及簡短論文。此刊在領導同道，推動學術交流，形成以國

史館為中心之一代學風，故十分重要，須專人經營。

其三，《國史擬傳》，此是極重要之傳統，標名國史擬傳亦最善，上紹清代多樣修傳風氣，足與其《國朝耆獻類徵》、《國朝先正事略》、以至《碑傳集》爭持高下，最值得稱道。

鄙人附帶建議，國史館宜只提倡短傳刊布短傳，決不可鼓勵人寫大傳，此是西方文家風氣傳入中國，國史之傳最多，俱是短傳，尚有遺賢未能納入，既是國史館，自宜多納短傳，惟並不反對私家寫大傳，如吳相湘之寫《孫逸仙先生傳》兩巨冊，乃是私家著述。國史館是國家名器，不像《傳記文學》、大陸文家尤喜寫大傳，像寫蘇雪林、謝冰瑩，每每超過四十萬字，乃表現文采，非真正史實，國史館不能跟風。

其四，收藏政府檔案、訪錄口述歷史亦是國史館重要傳統。惟既是採輯口述史，務要把重點集中於有作為有貢獻之一代循吏，要與中研院近代史所分清各自特色。至於編纂十年建設史料以至臺灣十大建設，亦必是國史館所要執行之重要任務。

到此，我願意冒昧的向貴館作點建議，像國史館最關緊要是每年要編成國史館年鑑出版，如早有此作，我仍要把話說完。

像古代之史官撰寫春秋、二百四十二年之每年紀錄出自史官之手，卻無一人出名字，而其章法形式，用字遣辭，如出一人之

手。當初已在紀元前八世紀到五世紀。以每年而言即是年鑑。《春秋》以後，至北宋而有司馬光所編之《資治通鑑》，其後明代尚出《續通鑑》。到現代史學大師郭廷以先生尚作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和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。我是郭夫子及門弟子，雖是後生末學，卻畢生重視年代學，謹守師門家法。

以鄙見建議，國史館當繼承《春秋》，貴館史官必須編錄《國史年鑑》，每年出過去一年之實錄，分送行政院及五院各部會及地方政府，使之作為參考，同時亦知國史館在做甚麼。此類年鑑必須專責資深人員即貴館有經驗之史官執筆撰寫，並須派一同道史官任其助手，助手須就每日紀事之下，儘量納入直接史料，合為《國史年鑑長編》，由副手任其事，二人合作。《長編》編成自作館內保存，仍然上架，以備專家參考使用。

還有一個建議鄙人認為重要，就是請國史館每年編刊年度職官表，藉供政府各機構參考，有永恆價值，亦須有專門製表史官擔當，以專責成，現今學術敗壞，製表人才不受重視，得不到鼓勵，亦難獲贊助，全靠為學術專業盡心之精誠，近代史所多年來只有魏秀梅教授和沈懷玉女士有編製職官表經驗，值得貴館仿行編刊。

國史館在呂館長領導下，奮發自強，開朗和眾，當有共策之各樣宏圖，鄙人謏言，不足重也。

四、第三層次：史學同道機構

在此所講史學同道，是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國國民黨黨史會，乃至《傳記文學》社。雖同是史學同道，而彼此志節、宗旨、用心，以至風格習慣實俱不相同。惟黨史會與國史館行事最為接近，向為合作伙伴。

若與《傳記文學》之風格而相較，同為撰寫傳記，國史館則手法嚴謹，秉筆直書，平實無華，簡賅精審，承傳國史紀傳傳統，以短傳為宗旨。而《傳記文學》則任作者自由發揮，往往馳騁文采，鋪張揚厲。務求宏肆，不顧簡賅，尤不慎於是否真實，乃是文家之作，非史家之筆。昔年劉紹唐先生號為野史館館長，亦與國史館、近代史所、黨史會合作無間，相信今後仍當彼此交流，維持合作舊貫。

接下來再討論國史館與近代史研究所之對應並駕齊驅，乍看彼此很相似而同行，其實一定要辨別清楚彼此是相對分殊，決然大有不同。蓋基本上職司功能不同，精神意趣有別。

國史館秉國家正史史官重責，首先是守藏固典檔卷之史，不能有失，不能錯漏。其次是記注每日發生史事，秉筆直書史實真象，不作任何評語論斷，以待世之識家藉以研考史跡，一字有偏，即是大錯。國史館承國家屬命，必須不斷撰著政治人物個人傳記，俾以供後世參考，乃史官必負之職責。

但凡以上所述，近代史研究所並不承擔任何職責，選題研究，毫無史官責任，不受任何限制，一唯自由心證，譏彈抑揚，全憑一己識斷，文責自負，面對後世，亦任自然淘汰，化為泡幻。

在此並非肯定近代史人員是天之驕子，有充溢資源，又能任選研討論題。其原因乃在中央研究院之設立，是要其各研究所之治學，要與世界上各國名家爭驂比靳，自然導致其研究人員要趕上世界潮流，即令不是分秒必爭，卻人人爭先恐後，一意創新，因而最喜追求新理論、新學說、新問題、新方法。凡此皆非國史館所當做。國史館人員可以掌握世變潮流，而用心卻在於塵埃落定，決不可參與一些新理論學說，而嚮慕追逐，大肆炒作。如此一來，心旌搖搖，筆下浮泛，怎能寫出千秋定論？國史館與新聞局職司不同，國史館豈可追逐風氣炒作時髦？此乃是譁眾取寵，決要快快改途，此非史官看家本領，甘冒此險，必遭跌蹶。

近代史所自 1955 年創所，在郭廷以夫子領導訓迪之下，造就第一代第二代專業學者，鄙人忝列門牆，是末學後進。與同僚努力策進，形成近代史研究堅強陣容。以編輯史料及撰寫專書為致力重心，每人各擅專長，自足獨當一面，以近代算學史而論，王萍教授所著《西方曆算學之輸入》一書出版之後，所中即不再有後繼之人。具見培植人才，實屬不易。其餘各位同僚相類，近代史所之能開創前五十年之廣泛學術成果，俱可

一一覆按，享受宏名聲譽，皆出於深心大力全神投注其中而有所得，吾身在其中，體會自深。

近代史所在數年之前將《近代史通訊》停刊取消，看似簡捷輕易，實是放棄學術領導權之意。學界老少人士，多不特為閱讀集刊、專刊，卻多人乃至教師學生俱必閱讀近代史通訊，蓋文不艱深，載述多樣，半年一期，提供出版消息、會議報導、史料介紹、每日記事、短文、書評，以至人物特寫，實構成學界之指示標竿，各界學者，亦唯近代史研究所風聲光影，為其趨赴之南針。

雖如此說，而近代史所尚有若干支撐之點。如林滿紅之經濟史研究，仍足以與國際一流學人周旋爭較，有其一定實力。如陳永發則與中共史研究者包括大陸同道，俱在伯仲之間。又如最近張力之從事編印《蔣介石日記》，若此日記出版，必能轟動中外學界，將有三十年為各家爭勝較力之熱門領域，張力必負重名。再若自今年啟步，由張壽安主領之近代中國學術流變之龐大研究組合，則是最新銳、最重大之學術史問題，為近代史所另闢一個史學論域，計畫三年，或將更有擴張潛力。

二十年前，學界領袖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先生能把黨史會、國史館、近代史所三個機構會合實力，共同召開各大學術會議，形成十年鼎盛之學術活動，彼此合作，創造豐富業績，令人迴思難忘。今時建議國史館仍當每年和三個機構相聚一次，不作重大舉

措，但作簡易之友誼交流午餐會，所費省嗇（以飯盒招待），而意義重大。吾拭目以瞻厥成。

五、第四層次：兩岸學者交流

國史館當今面對兩岸交流，因是政府官署，首先必須明曉分際，要明確站定政府立場。自然首先守住不獨、不統、不武之底線。進一步，也要明確守住九二共識，一中各表之底線。進一步也要宣示兩岸經貿合作，製造雙贏。要弄清楚政府煞費苦心，而能簽定 ECFA，免去淪為亞洲國際孤兒。亦必要洞悉我們怎樣賺取大陸資金而能挹注對美、日之貿易逆差。步調自然在不違離政府政策。

在兩岸之間交流，國史館不具重要地位，彼此並無對工機構關係。像其社會科學院，對工是中央研究院，雙方均有近代史研究所。彼有故宮博物院，我也有故宮博物院，彼有文化部，我有文建會及中華文化總會，彼有教育部，我也有教育部，彼此對工，方有來往，方有話題交換。

大陸雖無國史館，也會有學者造訪我之國史館。對於來客，基本要誠信，立意要友善，交談要虛心，辯詰要理性，莫使來客難堪。

大陸馬列史學理論已被揚棄，著作汗牛充棟亦全當作糞土，切別再提其前期流行之階級進化五階段論，以至走紅之農民起義

說。他們是怕再提起，臉上無光。

自八十年代鄧小平領導對外開放以來，我們這邊朝野觀點也就逐年有所變化，而產生不少錯覺。多人常自以為是，深信自己財富驕人，也真有實據，國民收入所得遠在大陸人民之上，可以施惠救濟他們。未料二、三十年來，雙方情勢逆轉，我們這方不能保持長久富裕，十多年來反而要靠賺大陸資財，填補對他國之逆差。乃是亞洲各國變了，東南亞各友邦變成與大陸來往密切，一概疏遠我們，以至經濟優勢不復存在。我們一向自我得意以亞洲四小龍龍頭地位，竟下落千丈，反而比大陸窮，真是令人有點啼笑不得。

其實我們在文化學術實力上也有嚴重錯覺，我們一直深信我們久與世界溝通，較大陸水準高，學術文化遠高於大陸。此一錯覺深入人心，比前一錯覺更嚴重更頑強，更不會放棄。

大凡要談兩岸，乃是彼岸此岸各為一整體，要就彼之學術文化與此岸之學術文化互相對比。我們必須知己知彼，不能有一廂情願想法。我們在此就史學界立場，當作一點人才造詣與學術出版彼此一併對比觀照，仍是很客觀可靠之手法。單以史學界言，我們全體包括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學，與大陸史學之人才及出版物比，整體而言五十年來我全體俱遜於大陸。在此是談兩岸，我們這岸的古史大本營要算是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包括臺大、師大、文化、東海、政大，合在一起

甚具龐大聲勢。尤其歷史語言研究所號稱天下第一所，一派武俠小說氣味，看來全是噱頭。在我實際研判，可作對比分析，自見高下。

此岸有傅斯年，可謂是百年不遇之學界領袖，其古史創見亦為後世信服。彼岸則有郭沫若為學界領袖，彼此對工，各不相下。人類學家有李濟，彼岸有夏鼐、賈蘭坡二位大師。甲骨文有董作賓、李孝定、張秉權，彼岸有郭沫若、胡厚宣。語言學家有董同龢、周法高，彼岸有呂叔湘、王力、丁聲樹。尚書學大師有屈萬里一人，彼岸有顧頡剛、陳夢家、劉起鈞、蔣善國四位大師。春秋史大家陳槃，彼岸有楊向奎、楊寬、楊伯峻三位大家。漢史大家有勞榦，彼岸有顧頡剛。箋注校詮古籍大師王叔岷，彼岸有楊伯峻、金景芳、王利器、陳奇猷、許維適、吳樹平六位名家。唐史大家有嚴耕望、藍文徵，彼岸有岑仲勉、唐長孺。宋史名家有姚從吾、宋晞、方豪，彼岸有鄧廣銘。明實錄名家有黃彰健，彼岸有吳晗、王毓銓。運河大家吳緝華，彼岸有史念海大師。經濟史大家全漢昇，彼岸大家有湯象龍、嚴中平、傅衣凌、孫毓棠四位大家。此岸清史名家有李宗侗，彼岸有鄭天挺、王戎笙兩位大家。近代史大家有郭廷以、李定一、吳相湘，彼岸有羅爾綱、范文瀾、翦伯贊。另有神話及民族學大師凌純聲、名家芮逸夫不在史家之內，而對岸有王獻唐、徐炳昶、徐中舒三位大師。

敘論至此，看來漏掉錢穆大師未提。自

因需有解說交代，要費些筆墨，故而最後開出，此岸有國學大家錢穆，彼岸有文獻學大家張舜徽。此說提出，必使此岸學者驚訝，是否可以作如此對工？因此自然話長。此非鄙人自專，乃是五十年前，有位流寓香港之文人，叫曹聚仁，他刊布大作《文壇五十年》有兩集，其中肯定指出張舜徽學問在錢穆之上，多年無人反應。惟我八十年代人在香港，竟聞說余英時教授稱讚張舜徽有學問，自然與曹聚仁之說不相干。下面我個人尚要交代，錢、張彼此對工，其學問不分軒輊，應可如斯觀。只是就錢、張二人生平著作言，張舜徽實不能望錢穆項背。二人之書我俱有讀，錢氏之書足以傳世，享名士林者有《先秦諸子繫年》、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、《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》、《國史大綱》、《朱子學案》等，而張舜徽全無傳世之作。我有其書三種，另亦閱讀其文獻學論文。最可推重者是其《史學三書評議》及《文獻學論著輯要》，我手邊常用。但以為《史學三書評議》僅二百二十頁，要談《史通》、《通志》及《文史通義》，未免只是簡略常解，不足以當宏著之列。故敢說不能望錢穆項背。至於錢、張二人，我俱見過。生平聽錢氏講演兩次，一在大學求學時，一在八十年代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聽其講演，並由歷史系主任孫國棟先生，亦是錢門大弟子，相約共聚，並特令我與錢氏坐一起敘話，有一些交談。關於張舜徽先生亦在八十年代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講演，我自親身入

座聽講。我在此可以估斷，願冒天下之非責。看來在學術承續，擔當開拓而言，張舜徽尤其不能望錢穆之項背。張氏只是個人飽富學養，而錢氏則開創新亞學派，在香港異族統治之地，延續堅守傳統文化學術生命，胸懷志節，表率當世，作育英才尤樹風聲。其門下之經學、史學、文學、哲學，人才輩出，前面提到之孫國棟是一位通鑑學名家，正人君子，醇儒風品，令人欽羨。二十世紀一百年間，史學非主流門派不到十家，錢氏之新亞學派乃居其一，不可輕估。

雙方人才對工卻未交結。此須要舉出此岸所缺不如對岸之各類名家，較量高下，此為關鍵。1. 古文字學，彼岸有唐蘭、于省吾、裘錫圭、李學勤，此岸全缺。2. 殷周青銅器名家，彼岸有郭寶鈞、李學勤，此岸則缺。3. 彼岸有醫藥文獻學大師馬繼興，此岸則缺。4. 彼岸有佛教史大師湯用彤、季羨林，此岸則缺。5. 彼岸夏史研究名家有徐中舒、楊向奎、李民、何光岳四位，此岸則缺。6. 海外島國、海上交通，彼岸有向達、馮承鈞二位名家，此岸則缺。7. 彼岸有畢生研治方志大家朱士嘉、傅振倫二位名家，此岸則缺。最當反省自愧的是彼岸有魏晉南北朝史名家周一良、賀昌群，此岸竟缺。又彼岸有遼、金史大家馮家昇，此岸則缺。以上九項對工比較，俱由彼岸超越，我們學界領袖，有何面目敢妄自尊大，師心自用？

若就出版學術刊物而對工比較，包括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年全部出版品，若與大陸

出版之《文史》、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論質論量皆落其後，再加彼每年每月出版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已是汗牛充棟，此岸之《大陸雜誌》亦不能對工比較，且又早已收棚下岡，有何臉面再自我偉大。此岸論人才論著作均落後於彼岸，與之交遊來往要虛心一點。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國史館同仁要有心理準備。

六、第五層次：面向國際

中華民國立足於世界，一定在國際上與各國周旋。行政院下設多樣機構，對內對外職司各有不同擔當，好像對外職責俱在於外交部與新聞局。但亦莫把國史館視為冷曹，切莫大意。須知國防部、外交部必要爭持權利。而國史館則須爭持名分，但凡國家名義，領土維護，與國防部、外交部職分一樣，永遠要站在前線。

面向國際，國史館所當堅守之底線是中華民國（The Republic of China），向來總統就職，一定要手按中華民國憲法宣示效忠中華民國。國史館定名分，與國家元首一致，要處處時時維護名義之嚴正。除了館長一位首長之外，每位史官成員，一樣須具此種職責。

面向國際，國與國之間的疆界，常是引起爭辯糾紛之起爆點，且必累積往昔歷史淵源。外交家亦須熟知邊疆區域變化之歷史，而國史館自更是備詢往古歷史背景之可靠

顧問。國史館之史官，必須早有邊界歷史演變之通識。並非須作學術研究，而則應具完備之邊疆地理知識，非一朝一夕即能養成此項學問者。如果貴館早有一、二位人才，熟悉周界變化之史，則因應偶發之事，不至倉卒不能充分應對，必至受外國所愚弄欺騙，是以建議貴館至少有兩位邊界歷史知識學者，其一對中俄全面邊界，其二為中印、中緬、中越邊界之史，須早有準備。至於海上邊界糾紛近常發生，而尤其釣魚台之地理與向來史事，均須充分掌握，以應付鄰國無理之侵佔。

面向國際列邦頻繁交往，而於我國對工之機構甚多，勢必交流因應。惟國史館在所有外國並無對等單位。但凡政界大老、新聞人士、學術權威、藝術明星，自可全不理會，不煩張羅。然亦不免有專訪之士，前來閱看史料，查考珍籍，無論白人黑人，國史館均須開門納客，禮貌接待，為國家維持體面。

七、結語

國史館乃古史官體制遺裔，並為當今政府功令之分曹。有其悠久傳統沿承與明確職掌，本館同仁，當須自信自勉。

館長即西漢以來之太史令，副館長即太史丞，全體人員凡入正職，即為史官，根本職司即是寫史，工作在撰著、在典藏、在記注、在製表、在製圖，此是國史館看家本

領，即居斯職，必須勝任。不趕潮流，不慕新奇，不炫奇說，不務玄理，俱須篤實，秉筆直書，乃是史官本分。

國史館名義典重，職分嚴正，不可妄自菲薄，將識斷裁定推委大眾，自失史權。對千秋萬世要有擔當，豈可隨世俗好惡蓬轉？

當前要務，常規而言，循故有行事，則提升《館刊》水準，在精不在多。續刊《國史擬傳》，徵集國家政府檔案及私家文獻。惟鄙人建議，須每年刊印《國史年鑑》，分送各政府單位，並同時刊印《年度職官表》，使各級政府通曉國史館所做何事。

館長已計畫編印《中華民國百年通鑑》，成事不難，惟期早日着手。鄙見以為尚當速編《臺灣十大建設檔案史料》，以供朝野參閱。此皆有裨國史館聲名，並有功於流傳後世者。區區淺談，就教於方家，保殘守闕，不敢持為是論。

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五日清明節
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

附記：本文係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國史館之講演稿。